

宣传工作与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启

聂文婷

(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党史教研部, 北京 海淀 100091)

[摘要]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中央就非常重视有关原子能、原子弹的宣传工作,从而为中国核决策的作出奠定了思想基础。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核决策后,周恩来首先强调,要公开宣传原子能的利用。在这一指示下,中国开展了有关原子能利用的宣讲教育活动,并在全中国范围内进行了“反对进行原子战争”的签名活动。此后,在迅即构建的发展战略的支撑下,以迅速实现的力量凝聚为核心,新中国原子能事业成功实现了快速起步。

[关键词] 原子能; 原子弹; 原子战争; 核宣传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17)05-0055-08

DOI:10.14119/j.cnki.zgxb.2017.05.006

1955年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建,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划时代的里程碑之一。为使原子能事业快速起步,中国在1955年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事实上,早在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爆原子弹之后,中共中央就开始重视核宣传工作了。在当时,虽然多是对有关原子能问题的时事报道,但是,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战略引导,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对苏联原子能和平利用国际合作倡议的公开表态,也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启提供了助推力量。

一、战略引导：中国核决策的思想先导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爆原子弹后,延安《解放日报》曾原文转载了国外报纸关于美国投爆原子弹的多条新闻,并撰多篇文章描写原子弹的破坏力。据当时在《解放日报》国际部工作的杨永直回忆:当时延安《解放日报》有关原子弹杀伤力

量的详细描绘,每天有几万字的报道。“我们的思想上产生了原子弹决定一切的观念。”^[1]对此,毛泽东指出:“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但是扫不掉,没有那样容易。”^[2-1]毛泽东的这句话,揭露了美国和蒋介石利用原子弹宣传加大原子弹的政治能量和军事力量的企图,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关于原子弹这样一个新鲜且敏感的事物,人们对其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影响于宣传。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2-2]因此,必须正确把握核宣传的政治方向。

中国早期核宣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认清时事,了解原子能,认识原子弹。1946年5月1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很快就成为中国核宣传的主要阵地。仅1946年,《人民日报》就刊载了

[收稿日期] 2017-05-19; **[修回日期]** 2017-06-11

[基金项目] 中共中央党校2014年度青年项目“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与‘两弹一星’精神研究”(DXQN-M201406)。

[作者简介] 聂文婷(1985-),女,内蒙古阿拉善盟人,历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

近40篇有关原子能、原子弹的文章,对国际社会关于原子能管制的情况、是否要摧毁现有原子弹的争论、是否要公开原子能秘密的讨论、苏联原子能和平利用进展现状等,进行了报道。此后几年时间内,美国和苏联在国际社会展开了一场有关原子能利用问题的博弈:美国企图保持核垄断,一边要求加强原子能管制,一边却在抓紧进行核军备;苏联在揭露美国企图的同时,加速了自身掌握原子能的进程。《人民日报》对美苏博弈进行了追踪报道。从数量来看,据不完全统计,1947、1948年两年内,《人民日报》共刊载相关报道40余篇,对美苏辩论、巴鲁克计划通过的来龙去脉、联合国大会解决原子能问题的进展情况等,作了详细的报道。

1949年4月20日,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在巴黎举行。围绕此次会议,《人民日报》刊发了有关原子能和原子弹问题的相关文章。例如,中国文化届响应世界拥护和平大会而发表的宣言^[9],约里奥·居里先生关于如何利用原子能维护世界和平的答记者问^[10],等等。随后不久,1949年6月,苏联掌握了原子弹技术,《人民日报》通过刊载多篇有关苏联打破美国核垄断的文章,进一步揭露了美国关于“原子弹决定一切”的舆论阴谋。总体来看,1949年全年,《人民日报》涉及原子能、原子弹的文章有一百多篇。经过宣传,人们能够科学地认识原子能、原子弹,尤其是对国际时事的追踪报道,还让很多人对原子能问题有了清醒的客观判断:在原子能问题的立场方面,美国企图无管制无限制地将原子能用于军事目的,而苏联力求禁止研制原子弹,并努力将原子能用于生产建设。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指出: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美国,在宣传中应该说明“美国是纸老虎”,“原子武器已非美国独有,且不能决定战争胜负。国土愈广,人口愈不集中,原子武器的作用愈小”^[11]。根据这一指示,随着全国大规模有关抗美援朝运动宣传的展开,核宣传的力度明显加大。

《人民日报》除继续报道有关原子能、原子弹的时

事外,还刊载了一些世界和平人士对原子能问题的认识。例如,1950年11月2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副局长南尼11月17日在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关于开展广泛活动以禁止战争宣传、禁止原子武器、普遍裁减军备及建立管制机构监督执行这些措施的报告^[6]。此外,《人民日报》还先后发文介绍了几本有关原子能的外文书籍。例如,由约里奥·居里先生等世界原子能研究权威共同撰写的《我要知道原子问题》一书。全书虽然只有5万字的篇幅,但却扼要透辟地介绍了有关原子能的多项问题^[7]。除新闻报道外,中国核宣传的另一主要方式是进行讲演。例如,在北京大学,10名物理系和化学系的教授及讲助们组成了一个原子弹讲演组,多次到各中学进行讲演。同时,物理系还成立了原子弹资料组,将搜集得来的资料整理成册,为讲演组外出宣传提供服务。当时正在北大工作的朱光亚还撰写了《原子能与原子武器》一文,由工会小组油印发出,作为对外宣传的重要参考资料^[8]。其他一些部门和单位也积极办讲座,宣讲原子能知识。1950年11月4日下午,青年服务部与中央人民科学馆联合举办大众科学讲座第22讲,由朱光亚讲《原子能与原子武器》^[9];12月2日下午,民建京分会在协和礼堂举行了第98次集会,邀请北京大学物理教授薛琴舫及助教李若帆作了题为《原子能与原子武器》的报告,为配合讲演,中央人民科学馆还放映了原子能幻灯片及影片^[10]。

从1951年开始到1953年,中国有关原子能、原子弹的宣传虽不像1950年那样密集,但是从宣传内容看,中国已经作出了明显的战略表态。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发表题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演讲。但是,苏联认为,美国“完全没有触及原子能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禁止原子武器问题,它既不能有助于制止原子武器的生产,也丝毫没有限制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性”^[11]。此后,随着美、苏两国新一轮有关原子能利用问题国际辩论的展开,中国核宣传在1954年时又出现了一个高峰期。与前期相比,中国在这一阶段的核宣传中,非常明确地表示了对苏联在原

子能和平利用方面的支持。1954年6月27日,苏联创建的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开始发电,中国科学界很快就在公开场合对苏联的这一科学成果予以很高的赞赏,并表态:要在党的领导下,借助于苏联科学家的帮助,“迅速完成各种高度基本科学的研究,包括原子能研究”^[12]。显然,中国已经有意识地在透露:中国致力于将原子能用于和平目的,要加强原子能的研究。

总之,在中国原子能事业正式开启之前,中国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核宣传工作。可以说,这是一场战略性质的宣传,也是一项未雨绸缪的工作,为中国核决策的作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二、公开表态:助推原子能事业的开启

1954年8月1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了NSC5431/1号文件。这是艾森豪威尔发表《和平利用原子能》演讲之后,美国制定的第一份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政策的正式文件。该文件明确指出:美国将通过签订双边协议的方式在原子能领域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9月24日,联合国大会第九届会议讨论通过:将美国代表团提出来的“在发展原子能和平用途方面的国际合作”的议案列入大会议程。11月5日,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开始讨论这一议案。美、苏两国有原子能的又一轮的博弈自此展开。对此,《人民日报》连续刊载了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维辛斯基除继续揭露美国核垄断的妄想外,还积极倡导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他说:“发展原子能并把它用来促进工业不发达的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广泛的计划,具有重大的意义。”^[13]

此时,美、苏关于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博弈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年,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问题。可以看到,尽管苏联在销毁和禁止核武器问题上言之有理,在此期间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也通过了《关于和平力量为裁减军备和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进行的斗争的决议》,但实际上,苏联仍无奈于美国先建立国际管制再销毁核

武器的执拗。于是,苏联决定,在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国际合作方面走在美国前面。既然是国际合作,就必须首先选择合适的合作对象。关于这一问题,苏联考虑到了一直在有关原子能问题的官方宣传中支持苏联,并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态想要掌握原子能技术的中国。

1954年12月4日,联合国大会第九届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在促进原子能用于和平目的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决议。以此为契机,苏联决定公开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分享核技术。1955年1月14日,塔斯社授权发表声明称:“苏联政府由于认识到把原子能用于和平目的的极大重要性,并且为了促进这方面的国际合作,准备传播苏联积累起来的有关的科学技术经验。”^[14]苏联答应为中国提供核技术帮助,推动中国在原子能的利用方面迈开重要一步。尽管在促使这项援助实现的因素中,苏联自身的战略需求占有很大成分,但苏联领导人对中国是基本信任的,而这份信任,离不开中国在原子能应用问题上的公开表态。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由李四光、刘杰、钱三强所作的关于铀矿资源、核科学技术以及国外原子弹研制情况的汇报。听完汇报后,毛泽东总结指出:发展原子能,“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15]当谈到苏联对华核援助时,毛泽东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16]这次会议在中国原子能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正式起步。

中国核决策的作出,正值国家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刚刚开始之时,而发展原子能事业对国家经济、科技、工业建设又有较高的要求,这种不对称的发展模式难免会引发人们对这一决策产生诸多不理解。同时,还有很多人缺乏关于原子的基本概念,以为原子是像煤、汽油那样的燃料^[17]。因此,在中国正式作出核决策之后,首要任务之一就

是要做好有关原子能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工作。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也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首先,通过《人民日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核决策。1955年1月17日,塔斯社授权发表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其他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帮助的正式声明:苏联政府已经向包括中国在内的5个国家提供广泛的帮助,“包括设计,供给设备及建设具有达五千千瓦热能的实验性原子堆,和原子微粒加速器”^[18]。这一声明立刻引起了相关国家的积极回应。在中国,《人民日报》于1月19日发表社论《在原子能问题上的两条路线》,高度评价了苏联在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国际合作方面作出的贡献^[19]。一直以来,《人民日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宣传平台,1955年1月19日的这一社论,是中国作出核决策后的第一份宣言书。

除了官方表态外,中国的科学家们也纷纷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表示对苏联核援助的赞誉,并作出在原子能和平利用上有所作为的积极表态。例如,1月27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时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会理事长周培源的文章,指出:“苏联对我国在核子物理学和原子能的和平用途方面的无私帮助,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物理学和有关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加速应用原子能的实现。”^[20]

中国在《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介上作出的有关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公开表态,实际上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起步作了初步的宣传。宣传与保密并非绝对矛盾,尤其在原子能的利用问题上,公开表态反而可以更好地保守细节之密。通过公开表态,人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也就可以自觉地担负起对这项事业的责任和义务。这样,此后有关原子能利用问题的宣传工作,就不是单纯的核策略宣传了,更多的是为原子能事业凝聚中国力量。

三、宣传教育:为原子能事业凝心聚力

1955年1月31日,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第四次

会议。会上,周恩来对关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掌握原子能。”^[21-1]对于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从积极方面来说,我们要公开地进行教育,认真地进行工作,积极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21-2]。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中国创建原子能事业的第一年,关于原子能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主要开展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宣讲原子能科学

早在1954年12月,即中国核决策作出之前,中国科学院就接到周恩来指示:组织在北京的科学家和教授向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负责人宣讲原子能的科普知识,让大家知道原子能的应用^[22]。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后,周恩来又对这项工作作出了具体的安排:由中国科学院主持,在统一对原子能认识的基础上,组织有关原子能和平利用的讲座。具体可以先由钱三强、周培源、钱伟长、赵忠尧讲授并录音,再在全国传播。为配合有关原子能的宣传教育,还可编写一些通俗易懂的小册子,在报纸上刊登相关文章。

1955年2月2日,中国科学院举行了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座谈会。会议传达了周恩来“要使广大人民了解原子能”^[21-2]的指示。在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宣传教育方面,会议作出组织开展有关原子能问题的通俗讲演会、编写通俗小册子的决定,并成立原子能通俗讲座组织委员会,推举吴有训、钱三强、周培源等9人,向中央和各地领导干部、学生、工人、战士宣讲原子能科学知识^[23]。随后,钱三强等20多位科学工作者以及高等学校的教授组成宣讲团,到北京和全国各地宣讲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科普知识。周恩来特别叮嘱宣讲团,不能只让少数人知道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意义,要让大家知道,尤其要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负责同志知道,而且宣传不仅要重视科学性,而且要通俗易懂,不能尽说行话。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要求,钱三强预先在宣讲团内部作了试讲,其他成员提出修改意见后,再次试讲,最后定型后再由宣讲团成员分头宣讲。

2月4日,钱三强在北京西皇城根干部学校礼

堂作原子能和平利用通俗讲座的首场演讲,除中央领导以外的各大部委干部听了讲座。竺可桢在听了讲座后作以下记录:“听钱三强讲原子能,听众极为拥挤,直至5点半始散。演讲极为成功。”^[24]尔后,演讲团成员还到部队、学校、机关、工厂等作了多场演讲。仅2月4日至3月5日,就在中央一级机关、全国性人民团体和部分学校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干部、青年学生和教师等举办了132次演讲,听众达16万人之多。很快,各地也纷纷成立了地方原子能通俗讲座组织委员会,开展演讲活动。例如,2月22日,西安成立了原子能通俗讲座组织委员会,随后,从3月5日到21日的17天内,组织了数场演讲,听众达46095人。针对民族特色,3月29日,呼和浩特组织了20多位蒙、汉科学工作者担任演讲员,分蒙、汉两种语言进行讲演。

为配合宣讲,讲座委员会还专门印刷了《原子能通俗讲座图表及名词解释》,供听众参考。此外,由杨澄中作顾问,原子能知识普及讲座委员会和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有关原子能的科普幻灯片。随后,还出版了以宣讲稿为主体的《原子能通俗讲话》一书。该书除重点介绍了原子能在工业、农业和医学上等方面的应用外,还表态:“我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样,坚决主张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25-1]，“同时,我国人民一定要在苏联帮助之下,迅速地发展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事业”^[25-2]。当年,该书共发行20万册,起到了普及原子能知识的作用。

此外,新闻媒介也加大了对原子能的利用宣传力度。1955年2月20日至3月1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送了钱三强、钱伟长、温济泽、周培源等有关原子能问题的谈话录音、讲话或文稿^[26]。1955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记者柏生对几位科学家的采访记录。在访谈中,钱三强通过介绍如何对付原子武器来说明其威力限度,赵忠尧则分享了他亲眼所见的1946年美国在比基尼岛爆炸试验原子弹的结果^[27]。

(二)开展签名运动

舆论宣传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方式。

早在1950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就在斯德哥尔摩号召发动了一个争取禁止原子武器和建立严格的国际监督的签名运动,有70个国家的5亿多人参与了签名。这次签名,用舆论的方式制约了那些想把对外政策建立在使用核武器基础上的政府行动。在此基础上,为了遏止超级大国利用原子武器扩充势力范围的企图,1955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再次发起了反对核战争的签名运动。

1月19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会议通过了《告全世界人民书》,指出:“在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反对原子战争的策划者。我们主张毁掉储存的全部原子武器,不管它们储存在那里,并且立即停止制造原子武器。”^[28]约里奥·居里先生在宣读这一宣言后指出:“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已经决定广泛地发动一个签名运动,以便表达全世界人民对准备原子战争的抗议。”^[29]响应这一号召,所有与会人员在《告全世界人民书》上签字,从而开始了全世界范围的签名运动。

在中国,签名运动先从回答“为什么要开展反对原子战争的签名运动”开始。对于这一问题,钱三强曾回答说:“如果全世界人民知道了为什么签名的重大意义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而几万万人民签名反对使用原子武器,也是给企图发动原子战争的统治者的一个沉重的打击。”^[30-1]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郑重表态:对于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六亿的中国人民将坚决支持这个号召,并积极采取具体的行动”^[31]。1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要支持这个签名运动。”^[21-2]

2月1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在北京召开联席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从2月14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广泛地开展签名运动。2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关于发动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的决议》,并发表社论《大规模开展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号召中国人民,举行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32]。

签名运动最早在沈阳展开。2月12日,沈阳成立了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委员会。当日,沈阳市人民委员会所属31个单位近3000名职工举行集会,在1小时内全部签了名。13日下午,沈阳第一机床厂各车间、科室召开了签名大会。会上,工人、技职人员代表们在讲话中一致表示要拿实际的生产成绩,为保卫和平事业贡献力量。除了城市各单位、工厂以外,沈阳农民也积极参与到签名活动中来。14日,沈阳市郊高坎村农民有608人签了名,占全村总人数的78%以上。

从2月14日开始,针对全国范围关于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活动,《人民日报》进行了追踪报道,连续刊载了《签名运动委员会公报》。在北京,工人阶级走在了运动的最前列。据统计,仅14、15两日,北京市钢铁、煤矿、纺织等36个国营厂矿企业,就有8万多名职工在《告全世界人民书》上签了名。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广大科学工作者、文学艺术界人士、各高等院校、北京郊区农民等也都召开了“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大会^[33]。

由于此时,有关原子能和平利用的通俗讲座已经展开,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借鉴这一方式,相关科学家还到部分单位进行了演讲。例如,为加强驻京部队有关原子战争的知识,2月16日,钱三强在北京南苑坦克兵部队作了“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报告,报告后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座谈^[30-2]。

近一个月,反对原子战争的签名运动如燎原之火,从首都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高校到部队。3月11日,中国人民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从2月14日到3月10日,仅仅25天,全国人民参加签名的已经有1.9亿人之多^[34]。

四、促进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快速起步

正如《人民日报》发刊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所说,“真正人民的报纸不仅是人民的喉舌,还应是人民的司机和人民事业的组织者”^[35],

中国进行核宣传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组织原子能事业。整体上讲,从1946年到1955年,中国的核宣传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在核宣传的每一阶段,中国都有的放矢:早期的战略引导是基础,此后的公开表态是前奏,核决策作出后大规模的宣讲教育是主体。从“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活动,到原子能知识普及和宣传教育工作,不仅向世界宣示了中国要和平利用原子能,更重要的是,为和平利用原子能凝聚了中国力量。

通过宣传教育,纠正了人们早先存在的诸如原子能就是原子弹、原子弹神秘莫测、原子弹威力巨大无比的认识偏差,使人们看到了原子能有伟大和广阔的和平用途,从而对原子能事业充满信心。1955年8月5日,首都各界人民举行了反对原子战争与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大会。会议一致通过决议,指出:“我们要求和平的环境,我们尤其反对原子战争,反对原子武器的任何试验和使用。……我们热烈地希望原子能被全人类所掌握控制而使用于和平用途上。”^[36]

通过宣传教育,全党上下一致认为,必须首先从战略上支持原子能事业,应该给予原子能事业较高的战略定位。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要意义。他说:“科学技术新发展中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泉源,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在一起,无论在和平的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37]必须把发展原子能事业当作科技发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一项重要方针任务来看。1956年12月20日,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直接领导下,在600多名各门类、各学科科学家和近百名苏联专家的共同努力下,《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正式呈报。纲要确定了12个对整个国家生

产技术基础有根本性影响的重大且复杂的科技研究项目,第一项就是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与此同时,为填补中国在一些急需的尖端科学领域的空白,规划委员会还制定了1956年4项紧急措施,包括优先发展核技术^[38]。

通过宣传教育,核科研工作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核科学技术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愈发深切地体会到了自己担负的重任。有关原子能的公开宣传,是召唤书,又是动员令,唤回了一批在海外的核研究工作者,也为核科学家们的工作注入了动力和能量。他们既是核研究的主力军,也是生力军。他们一边积极开展科研工作,研制实验设备,还一边培养专业的核研究人才。当时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从国内其他单位抽调一批原子能研究专家集中筹办新的原子能科系或专业。1955年五六月间,分别从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和复旦大学抽调了胡济民、虞福春、朱光亚和卢鹤绂等物理学家,到近代物理研究所组建了一个培养原子能科学技术力量的机构——近代物理研究室,代号为6组。1955年下半年,近代物理研究室正式划归北京大学,更名为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二是从国内各有关高等院校相近专业的高年级学生中选调一批学生改学原子能专

业。1956年10月27日,清华大学成立工程物理系,当年便从电机、机械、动能等系抽调二、三年级优才生各43名、50名作为待成立的工程物理系的首批高班学生,并于当年和次年以机械系的名义在全国直接招收工程物理专业新生536名。第三种方式是经国务院批准,由蒋南翔和钱三强负责,从在苏联和东欧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了350名与核研究专业相近的学生改学核科学和核工程技术专业。很快,原子能研究领域就涌现出一批年轻的中坚力量。而早先成立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力量也逐渐充实,充满生机,学科由最初的6个发展到22个,学科分支60个,共有工作人员638人,其中科研技术人员377人,包括19名归国高级科学技术专家。

有了战略支撑,又延揽并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从业人员,随着中苏两国在原子能和平利用方面5个协议的逐步签订,中国原子能事业成功实现了快速起步。这其中,不论是原子能事业的战略部署,还是原子能科研工作的蓬勃兴起,都离不开原子能事业的从业者们和社会主义建设各行各业的人们,对这项事业的由衷肯定和大力支持,而人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有关原子能事业的宣传工作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 [1] 杨永直. 我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日子[N]. 上海:解放日报,2004-04-27,(6).
- [2]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毛泽东选集:第4卷[G].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33^[1], 1134^[2].
- [3] 中国文化届发表宣言 响应召开世界拥护和平大会[N]. 北京:人民日报,1949-04-09,(3).
- [4] 原子能理论权威居里谈和平运动 世界人民将赢得胜利 战贩奢谈原子战只是一派谎言[N]. 北京:人民日报,1949-04-20,(3).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439.
- [6] 郭思勤. 德田球一谈原子弹与原子能[N]. 北京:人民日报,1950-11-22,(3).
- [7] 逸 君. 读《我要知道原子问题》[N]. 北京:人民日报,1950-11-01,(5).
- [8] 北大通讯组. 北大教授讲助投入抗美爱国热潮 学习时事,举行讨论座谈,参加讲演宣传,并编写书刊[N]. 北京:人民日报, 1950-11-18,(2).
- [9] 隋 根. 大众科学讲座[N]. 北京:人民日报,1950-11-04,(6).
- [10] 新知识座谈会 讲原子能与原子武器[N]. 北京:人民日报,1950-12-02,(6).
- [11] 李延宁. 和平利用原子能和禁止原子武器[N]. 北京:人民日报,1954-12-23,(4).
- [12]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代表们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发言(之十一)[N]. 北京:人民日报,1954-09-27,(4).

- [13] 联大政委会结束原子能和平用途的国际合作的一般性辩论 维辛斯基再次阐明苏联的态度和主张[N].北京:人民日报,1954-11-21,(4).
- [14] 讨论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今年内召开 苏联将提出原子能电站报告 即将建议联合国咨询委员会把相应项目列入国际会议议程[N].北京:人民日报,1955-01-16,(1).
- [15] 李 觉.当代中国的核工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14.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不尽的思念[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299.
- [17] 袁翰卿.革命干部一定能够夺取科学的堡垒[N].北京:人民日报,1954-01-17,(4).
- [18] 新华社更正[N].北京:人民日报,1955-01-21,(4).
- [19] 在原子能问题上的两条路线[N].北京:人民日报,1955-01-19,(1).
- [20] 世界亿万爱好和平人民的真诚愿望[N].北京:人民日报,1955-01-27,(4).
- [21] 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次会上的讲话记录(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一日)[J].北京:党的文献,1994,(3):18^[1],19^[2].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436.
- [23] 我科学院举行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座谈会 决定成立原子能通俗讲座组织委员会并选出负责人员[N].北京:人民日报,1955-02-03,(1).
- [24] 樊洪业.竺可桢全集:第14卷[G].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22.
- [25] 原子能通俗讲座组织委员会.原子能通俗讲话[M].北京: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1955:35^[1],39^[2].
- [2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原子能问题广播节目[N].北京:人民日报,1955-02-20,(3).
- [27] 柏 生.三位原子核物理学家谈和平利用原子能和反对使用原子武器[N].北京:人民日报,1955-02-28,(3).
- [28] 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告全世界人民书[N].北京:人民日报,1955-01-22,(1).
- [29] 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扩大会议上 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的发言[N].北京:人民日报,1955-01-22,(1).
- [30] 葛能全.钱三强年谱长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256^[1],253^[2].
- [31] 在伟大的号召下行动起来[N].北京:人民日报,1955-01-22,(1).
- [32] 大规模开展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N].北京:人民日报,1955-02-13,(1).
- [33] 郭沫若.让原子狂人们发抖吧! 吴玉章.反对使用原子武器[N].北京:人民日报,1955-02-20,(2).
- [34] 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迅速发展 全国签名人数已近二亿[N].北京:人民日报,1955-03-12,(1).
- [35] 杨秀峰.人民日报发刊志祝[N].北京:人民日报,1946-05-15,(2).
- [36] 首都各界人民反对原子战争与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大会决议[N].北京:人民日报,1955-08-06,(1).
- [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36-37.
- [38]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发展计划司.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计划(1949-2005)[M].北京:科技文献出版社,2008:50.

(责任编辑 宁 静)

Publicity Work and the Opening of PRC's Atomic Energy Cause

NIE Wenting

Abstract: Before the founding of PRC,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had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ublicity of atomic energy and bomb, which laid a foundation thought for China's nuclear decision-making. On January 15, 1955,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made the decision to develop China's nuclear energy. Then Premier Zhou Enlai emphasized the publicity for the use of atomic energy. Under this instruction,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about the use of atomic energy was carried out and a nationwide petition against atomic war was conducted. Hereafter, under the support of rapid conduction of nuclear development strategy with rapidly gathered strength at its core, PRC's atomic energy cause achieved a successful quick start.

Key Words: atomic energy, atomic bomb, atomic war, nuclear publicity